

中国的人口与现代化

郭志刚

一、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地位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一节,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九个方面的定义,既概括了现状,也涉及了基本实现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下起步的。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人口和地理环境时常用的表达方式是称其为社会生活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



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对恩格斯的这些话,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曾有过重大理论分歧,有人认为这些话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我国 80 年代人口理论形成中,又对上述论断给予肯定,并以此为据强调人口的重要性。如果认真学习恩格斯上述著作的全文,则可以明了,全书的主题是坚持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及其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是婚姻、家庭、国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上述提及的两种生产并不是并列的,前一种生产才是基础性的。这其实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唯物史观原理,人口是社会生活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条件,并且也是社会生产的产品。中国今天的庞大人口是以往千百年小农经济的产品,又是我们今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这是我们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为了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中国人口的发展自然要从属于这个基本目标,人口规划、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调整人口再生产及其与此有关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出发点。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的问题。一方面人口问题反映的是人口的不同方面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发展不协调,另一方面人口问题需要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最终解决。

在有关文献讨论中,人口问题主要包括人口的总量问题、人口的结构和分布问题,以及人口的素质问题。其中,人口总量及人口



性别年龄结构属于狭义的人口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多、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这些方面可以通过人口规划、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对将来的人口加以调整来解决。当然,这些手段是在整个社会经济背景中实施的,人口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的综合治理。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更是社会经济研究的内容。人口社会经济构成的调整已经远远超出狭义人口工作的范围,而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结果。最后,我们通常所讲的提高人口素质,实际上是说提高国民素质,因为国民素质水平的许多方面可以在人口构成统计指标中反映出来,而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不是狭义的人口工作所能根本解决的。

在当前广为宣传的人口理论中,并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明确的划分,因而是一种广义的人口理论。它虽然有将人口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联系起来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人口概念的宽泛化导致人口研究本身的泛化而容易失去人口学本身的研究焦点。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极大丰富,而且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体制模式的深刻转型。与此相适应,中国人口也需要一个转型,即挣脱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建立新型的人口再生产机制,进而逐步达到一个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使人口发展逐步进入一种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进步相适应和协调的状态,成为社会良性循环的保证因素之一。

二、中国当代人口发展的基本情况

1. 人口总量与人口增长速度。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在总体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各地区发展差异极大的条件下,解决人口问题是非



常困难的。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995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2亿,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21.4%。中国在清代以来就已经进入人口较快增长的阶段。本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加快,人口总量越来越大(见表1和表2)。

这样庞大的人口总量意味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人均自然资源条件水平较低。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占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从建国初期的2.7亩大幅度下降到现在的1亩多,中国必须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1%的人口。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综合考察委员会估计,中国的整个自然环境的最大人口承载力是15至16亿,许多短缺资源的承载力已经出现缺口。1996年全国土地利用状况调查估计耕地面积为20亿亩(以前估计为14亿亩),虽然使人均耕地面积从原来估计的1.2亩上升到1.67亩,但这个新信息对于粮食问题的意义到底是喜是忧还是个问题。首先,在人均粮食仍然十分紧张的现实条件下,说明单位耕地粮食生产能力的水平比原来估计的要低得多。其次,这意味着可新开垦的耕地数量实际大幅度下降了。第三,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还会有所下降,特别是由于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带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最适合粮食生产的耕地转为其他用途,对粮食的生产和供给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就人口与粮食关系而言,这一新信息反映出的情况实际上比原先的估计更为严重。加上其他方面资源、环境的制约,中国面临的人口局势仍然是十分严峻的。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形成的压力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表1 中国不同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

年代	间隔(年)	人口平均年增长率(%)
1840-49	109	0.25



1953-64	11	1.8
1964-82	18	2.1
1982-90	8	1.5
1990-95	5	1.4

注:根据历史资料,1840年中国人口为4.1亿,1949年为5.5亿。

表2 中国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的变化

年份	总人口(亿)	少儿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	老年人口%
1953	5.7	36.3	59.3	4.4
1964	6.9	40.4	56.1	3.5
1982	10.0	33.6	61.5	4.9
1990	11.3	27.7	66.7	5.6
1995	12.1	26.7	66.6	6.7

2. 人口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人口的基本结构,可以用少儿人口(0-14岁)、老年人口(65+岁)、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分别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简单表示。通常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大称之为人口老龄化。从表2可以看出,自1953年以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先年轻化后老龄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1973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不断降低生育水平造成的。当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例超过7%以上时,就称该人口属于老年型人口。表2说明,中国人口正在趋近于老年型。

因为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需要社会来负担,因此又可以用抚养比来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每百人需要抚养多少人。从表3可以看出,1973年以前总抚养比是提高的,并且这一提高完全表现在少儿抚养需要的增长方面。从计划生育工作展开以后,总抚养比开始下降,这一下降也主要表现在少儿抚养减少方面。但是由于人



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从 1990 年以后,老年抚养的增加已经超过了少儿抚养的减少,因此总抚养比出现了再次提高。中国现在的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代”,总抚养比较低有利于经济起飞。但是人口老龄化会逐渐从老年抚养方面提高总抚养比,而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较低,少儿人口比例也已经很低,少儿抚养比已不可能再有较大幅度降低。

表 3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亿)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总抚养比
1953	3.38	61.2	7.4	68.6
1964	3.87	72.0	6.2	78.2
1982	6.15	54.6	8.0	62.6
1990	7.53	41.5	8.4	49.9
1995	8.06	40.1	10.1	50.2

三、关于今后中国人口发展的讨论

党中央提出的“九五”计划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个目标强调将人口与发展统一的“人均”观念,表明我们将从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两个侧面积极努力,表现了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的战略。在经济已经获得初步发展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的条件下,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克服另一种盲目乐观和麻痹松劲的情绪,自觉地、扎实地、持久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社会目前十分关注人口问题。关于人口总量、人口结构、迁移流动、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婚姻与家庭、教育与健康,讨论很多。但作为专业研究,有几种倾向值得注



意。有的只从一个方面来研究,并只就一个方面的问题来提出对策,这种倾向容易导致片面化的对策。有的并列多种人口问题,而不讨论对策,这种态度容易混淆不同层次的问题,导致无法决定对策。还有一种是根本不重视人口问题,只强调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人口问题,这种倾向违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由于人口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而仅就某个方面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与其他方面的解决方案相矛盾,因此探讨人口问题需要综合分析,并在综合分析中找到主要矛盾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分清主次,对整个问题有全面的把握,制定相应的政策。

1.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看人口发展。

当前,中国的生育率虽然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由于人口惯性,每年仍然以 1300 多万的平均增量增长。许多人口预测都表明,即使在这样较低的生育水平,人口惯性增长仍会持续到下一世纪的 30 年代中,届时的总人口将达到 16 亿左右。还必须看到,当前的生育水平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并且是十分不稳定的。考虑到生育水平的不平衡、不稳定,如果生育水平在今后发生一定反弹,未来总人口突破 17 亿、甚至突破 18 亿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因此,人口总量问题仍然是人口问题当中的主要矛盾方面,人口数量的控制在人口问题的解决中仍然排在首要地位。这一点并没有因生育水平已经较低而有丝毫的变化,并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始终如此。

在经济学上,资源可以相互替代。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家富了是否人口压力就已经缓解了?或者,是不是经济富裕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考虑问题时要考虑到大国效应。以粮食为例,如果说,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进口粮食来解决问题的话,大国就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当前世界粮食总产量是可以满足世界总人口需要的,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粮食紧缺的状况之中。特别是,粮食



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外界多方面的控制和竞争,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在未来粮食供给上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制定政策保持高度粮食自给率是必须的。这是保证中国独立自主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何况,中国面临的资源紧缺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粮食一项。再如,小国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劳务输出获得缓解,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企图通过这一途径来解决人口问题谈何容易。

计划生育工作有利于控制人口总量,因而有助于控制人均资源拥有量不继续恶化,有助于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一个较好的人口环境条件,也为中国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根据联合国 1992 年的人口预测,1995 年全世界人口为 57 亿,到 2000 年将增至 62 亿,到 2025 年将增至 84 亿。全球人口在今后仍然呈现出很大的增长动量。应该指出,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是按照各国当前人口生育水平计算的,而中国已经加入到较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如果中国放松计划生育工作,由于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全球总人口在预测结果的基础上再多增加几亿就将是预料之中的事。因此,中国人口计划生育的成功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全球人口未来发展的局面,关系到全球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全世界能否尽早跨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2. 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人口发展。

中国正处于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之中。过去体制的束缚打破以后,一些多年积累的矛盾都显性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涌向第二、第三产业。统计资料表明(林毅夫等,1994),在 1978 年至 1992 年期间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人数增加了 7755 万人,占全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人数增加量的



60.5%。如果考虑其他非农产业就业形式,如进城务工经商等,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更大了。在全国劳动力总数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已经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1992年的58.5%,而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从1978年的29.5%提高到1992年的41.5%。这一比例变化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发展趋势带来的,并且是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必然经历的过程。经济结构比例的变化意味着极为巨大的劳动力转移的绝对数量,给就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是今后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更加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部门中原有劳动者还是新加入的劳动者,都需要配备较多的资金和较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而且需要劳动者具有相应的文化技术素质。虽然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前一段时期吸纳了很大一批转移的劳动力,然而随着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粗放的劳动密集型将逐渐转向集约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吸纳能力会减低。而城市的国有企业本身已经长期存在冗员过多和其他负担,目前面临转轨的挑战,加上也需要提高效益,从粗放型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经营,因而在吸纳转移劳动力方面也不会很宽松。所以,现有劳动力转移与经营模式转轨构成了一对矛盾,在世纪之交以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就业困难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在此之上,如果人口增长控制不住,新增劳动力数量过大,无疑是雪上加霜,使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变得更大。

一些人看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缺乏劳动力的经历,而怀疑中国是否正在重蹈其复辙,其根据是不足的。首先,中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现在劳动力已经大大过剩,并且按照略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假设所作的人口预测(林富德等,



1995;杜鹏,1994。其中,杜鹏定义的劳动年龄人口为15-59岁,这更符合中国情况。后面的具体数字引自杜鹏。)反映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发展在2020年以前仍然保持正增长率,2020年以后虽然转变为负增长率,也只在-0.7%以内,并且2040年后不再降低,并略有些提高。并且,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发展趋势是,从1995年的7.3亿持续增长到2020年的近9亿,达到峰值。然后,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然而到2060年仍然拥有7.4亿的规模。也就是说,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劳动年龄人口不会少于现有的规模。这样的劳动年龄人口发展在中国实际条件下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其二,根据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未来劳动力需求方面的矛盾主要在劳动者的素质方面,而不是在劳动者的数量方面。控制人口数量是有利于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的。其三,即使发生劳动力短缺,也可以由技术和资金或引进劳动力来弥补。而且,劳动力过剩不仅是经济问题,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劳动力过剩问题的严重性将远远超过劳动力短缺的严重性。考虑到大国效应,劳动力的内部调节潜力很大,因此大国出现严重劳动力短缺是很少见的。从资金技术较少而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实际情况来看,各个地区大体上总要经过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不平衡,这在另一方面为劳动力资源的调配提供了很大的余地。此外,中国要从长远趋势上逐步达到可持续发展,靠总体上增加劳动者数量来维持经济增长根本不是出路。

3. 关于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的关系。

中国在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伴随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实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日益老龄化。继续严格抓紧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自然就会更快,未来老龄化高峰期时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首先,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由之路。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逐步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甚至零增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这些人口统计数字的背后蕴含的实际意义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从发展趋势上人口老龄化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人口的现代化。

第二,生育率的降低的确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也的确可能形成一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严格地说,人口老龄化形成的问题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源于老年人口绝对量的问题。未来庞大的老年人口正是现在已经出生的人口。这一绝对数量的问题,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而是过去没有及早实行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并且,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恰恰缓解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现在即使放松、甚至取消了计划生育工作,也丝毫无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口的数量。而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却十分有利于为中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一个良好的人口条件,使社会 and 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条件来解决未来老年人口的问题。当然,计划生育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却为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更好提供了基础。正是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才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第三,就中国的发展水平而言,无论是就未来人口老龄化而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还是就未来老年人口庞大的问题,首要的是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也就是社会从宏观经济能力上为未来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提供充分的资源。

年龄结构比例和抚养比只是人口数量统计指标,对它们的理解和应用应该与实际国情相联系。当人们看到人口预测的未来老年人口比例很高时,很自然地会想到通过放松人口控制,多生育一



些孩子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是,这样的结果只是在人口统计上表面解决了问题,而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是加重了实际问题。从宏观上分析,放松计划生育就意味着全国生育率重新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如果这样,中国的人口增长便会遥遥无尽头,使已经负担过重的资源环境状况濒于崩溃。从微观上分析,即从家庭和子女养老的角度来看,现在放松计划生育也并不能解决未来所有老年人的问题,而只是缓解了那时年轻老年人的问题,这些人是当前正处于和即将进入婚育高峰年龄的出生队列。根据人口预测,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将在 2035 年左右,而这一时期的老年人是 1975 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中的年轻者现在正好刚刚进入生育阶段,而他们中的年长者现在已经完成了生育过程。现实情况是,现在的年轻一代还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老年社会保险,享受未来的老年社会保障;而困难最大的是未来高龄老年人(即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出生队列)的问题,因为他们劳动年龄时期正处于老年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的转轨时期,而他们在未来时期的高龄化本身意味着进入困难最多的阶段,而又逢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因而社会经济支持能力相对较低的阶段。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正是已经为中国计划生育作出巨大奉献的一代,是在未来养老事业中尤其应该得到重点保障的一代。所以,现在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来解决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未来中国养老事业的重点人群的问题,反而容易导致忽视发展老年社会保障、过分强调家庭养老,推脱和放弃政府和社会应该担承的历史责任。并且,社会的发展要求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建立、健全中国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养老的经济职能应该逐步由家庭供养为主转向社会供养为主。同时,我们已经有一代人已经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和经济、社会、人口的转型作出了贡献,这一伟大事业应该得到实现,决不应该半途而废。

第四,从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角度来分析,企图



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有欠考虑的。20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大大降低了少儿抚养比,因而也大大降低了总抚养比。从人口预测(林富德等,1995;杜鹏,1994)可以进一步计算出,现在到下一世纪40年代整个期间,少儿抚养比几乎是单调下降的,老年抚养比是不断提高的。而总抚养比的变化动态则是两者的合力作用,表现出来的是先下降而后上升。其中2030年以后的总抚养比是比较高的,主要反映出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大提高的影响。但是这里所引用的人口预测是维持在略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基础之上的。如果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即放松计划生育),便意味着少儿人口增长率要高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因而少儿人口抚养比将减缓下降速度。而现在提高生育水平只有在今后15年以后才会随新生人口的年龄推移形成对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推力,进而缓解老年抚养比。由于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实际进入劳动的年龄也是要提高的。这预示着今后劳动年龄的实际下限将不再是15岁,同时意味着未来实际少儿抚养的增加。所以,试图用提高生育水平来缓解老年抚养是靠多年的增加少儿抚养并相应提高总抚养比来实现的。如果考虑到放松计划生育工作而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反弹,则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第五,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老龄化程度高形成的问题并不是一般的人口结构问题,也并不能完全由人口统计方面的测量估计。在分析人口问题时,我们必须将中国的具体国情考虑进去。所谓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都在进行劳动和生产的人口,劳动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素质并配备必要的劳动条件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力。中国面临的是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要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去,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已经揭开了这个历史性转折的序幕。同时,城市企业久已积压的冗员过多矛盾也在体制转轨中日益显性化。一方面存在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一方面劳动力素质很低,还有一方面是资金和技术的短缺,形成了中国在今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有十分严重的就业困难和失业问题。同时,由于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在市场竞争的驱动下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通过科技进步和加强经营管理来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将会逐渐弱化。所以,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劳动力不是短缺而是过剩。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人口老龄化问题就不再只是与人口年龄结构相连,并且是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实际就业水平相伴的。因此,局限于仅仅从老年负担比来考虑,可能会被统计数字掩盖了现实的问题。过剩劳动力不仅不能真正担负支持老年人口,反而需要由社会来负担。所以,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恐怕结果反而是南辕而北辙,不仅不能真正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能力,反而背上更沉重的就业问题包袱。

四、总 结

综上所述,在当前生育水平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也决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抓紧抓好。在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中,人口数量还是中国人口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环境的制约所决定的。人口老龄化或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由于生育水平已经较低而上升为主要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口老龄化所形成的问题不严重、不需要研究和制定对策;而是说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的对策应当服从于人口增长的控制,不能从放松计划生育的角度寻求出路,而是应当从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着手,并鼓励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政府和社会还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大力发展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解决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困难。对于老年保险这样关系重大的制度,必须加强宏观管理,由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于承办老年保险的经营,给以优惠政策,



并加强监督和指导。以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信用和吸引力,鼓励人民群众广泛参加老年保险。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问题的各个方面有清醒的认识,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趋势分清这些方面的主次,抓住重点,带动其他。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决不能有丝毫松懈;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主要通过社会发展积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通过发展教育培训、发展卫生和健康事业来解决人口素质问题;计划生育工作要下大气力搞好,实现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的两个转变,以适应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的新形势,广泛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提供优质服务。而所有关于人口问题的工作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

本文参考文献: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2 Revision. New York: 1993.

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林富德、翟振武,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